

经济学如何记住历史：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时间尺度

杨虎涛

〔摘要〕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之所以必须“挖掘历史”，是因为新范畴、新命题和新理论的生长空间在于复杂性高、排他性程度低、必须容纳竞争性假说的领域，而这类领域天然具有历史的深度与广度。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历史维度研究分散于短期政策评估、计量史学的持久性研究与传统历史学三个相互隔离的领域，尚未形成有效合力，而持久性研究本身也存在工具变量公地悲剧、路灯效应等局限。要从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无论是文明基体的集体认知框架，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自主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范畴与理论命题，需要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形成研究合力。时间尺度是平衡理论抽象性与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论前提，不同的时间尺度有不同的问题导向和因果机制且适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在文明史尺度上提炼中华文明基体的特征，推动文明史、制度史、政策史三个尺度的知识协同生产，有助于建构具有主体性、可对话、可扩展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 时间尺度；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历史自然实验；文明基体；两个结合

一、引言

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历史是提炼范畴、形成命题的思想来源。新的经济学范畴和命题，往往不是从既有理论的内部演绎中产生的，而是在既有范畴、理论框架无法解释特定历史现象时被倒逼而形成的。与此同时，历史也是发现机制的必备条件。因为社会科学无法进行严苛的可控实验，历史进程就成为替代可控实验的开放实验场，通过长期的历史观察与跨情境比较，识别那些在不同条件下反复被触发的因果机制，才能将经验规律提炼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

历史在经济学研究中总会以自觉或不自觉、明显或不明显的方式存在。从短期的政策效果评估到长达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计量史的持久性研究（persistence studies），往往在实证方法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其中的数据和对应事件的时间尺度不同而已。政策史尺度的研究以数年至数十年为窗口，评估既定制度框架内的政策净效应；持久性研究则将时间窗口拉伸至数百年甚至千年，试图识别历史事件对当代经济的长期影响。但两者本质上都是试图对开放实验进行因果分析，只不过在实验的时间长度、数据来源等方面存在差异。

经济学之所以需要历史，是因为对于难以进行可控实验的社会科学而言，更适宜的科学观是巴

作者：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研究”（23&ZD129）阶段性成果。

比伦式的 (babylonian) 科学观, 而不是欧几里得式 (euclidean) 的科学观。^① 前者强调多起点、多路径、相互校验, 不追求单一公理根基; 后者强调从少数公理出发演绎全部真理, 追求唯一、严密。21 世纪以来, 经济学明显表现出从欧几里得式的科学观向巴比伦式的科学观的转向, 开始试图从单一框架的演绎体系转向对情境、历史和跨学科证据更为开放的研究形态。^② 其中, 历史分析尤其受到重视。虽然这种繁荣中仍然存在以理解历史本身为目标的传统经济史学家和用计量方法进行持久性研究的现代计量经济史学家之间的分歧^③, 但经济学家们普遍认识到, 经济学需要“记住历史”。

经济学以怎样的方式记住历史, 决定了它从历史中得到什么。当代经济学家记住历史的主要方式是在持久性研究中探讨今天的结果和历史事件的关系, 把历史事件转化为因果识别的来源, 历史的价值主要看其能否为当代问题的实证分析提供干净的外生冲击。这种方式的确可以突出经济学的“历史重要”, 但如果“记住历史”的方式是不区分时间尺度、在工具和数据导向下选择性地记住特定时间段的特定事件、割裂时间尺度之间的有机联系, 就容易产生系统性的解释偏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需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④。在这里, “挖掘历史”不仅要在历史中寻找数据, 更是要从历史中提炼范畴、创新理论。如何挖掘历史、在哪个尺度上挖掘、用什么方式挖掘, 会影响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度与广度。如果在记住历史的过程中放弃对不同时间尺度的观察分析、不能形成各个时间段的研究合力、不能区分不同时间尺度的历史现象受制于不同的因果机制, 就会丧失挖掘历史的系统性。

余文安排如下: 第二节梳理当前中国经济学历史研究的三种形态; 第三节建立时间尺度的分析框架; 第四节重点讨论如何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形成研究合力, 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二、当代经济学如何“记住历史”: 现状与局限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 历史是经济范畴生成和命题检验的基本场所。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乃至马克思的理论构建, 无不深植于历史观察之中。即使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早期, 在经济学还处在多元主义的时代, 经济学家们也十分关注历史。约瑟夫·A. 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就认为: “‘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 在于掌握了技巧或者技术, 而这些技术可以分为三类: 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谓的‘经济分析’。”^⑤ 1925—1944 年期间, 美国三大顶级经济学期刊 (AER、QJE、JPE) 的经济史论文占比达到了峰值。^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以德布鲁、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物理学的数学形式主义引入经济学, 由此经济现象被抽象为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 理论的严谨性由数学推导的内部一致性来界定。历史研究方法也被视为无价值的资料整理, 甚至是一种天真的经验主义。^⑦ 20 世纪 60 年代,

① J. Kuorikoski, and C. Marchionni. “Economic Models and Their Flexible Interpretations: A Philosophy of Scienc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24, 31 (4): 241-248.

② D. Ross. “Economics is Converging with Sociology but not with Psych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23, 30 (2): 135-156.

③ A. Bisin, and G. Federico. “Merger or Acquisition? Introduction to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8786, 2021.

④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5 页, 人民出版社, 2016。

⑤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 1 卷, 31 页, 商务印书馆, 2017。

⑥ D. N. McCloskey. “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6, 14 (2): 434-461.

⑦ G. Myrd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78, 12 (4): 771-783.

福格尔和诺斯等人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浪潮中发起的计量史学运动，代表的只是历史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学习，而不是经济学对历史的重新接纳。即便如此，这场运动的成功也需要等待数十年。1975—1984年间，三大顶级期刊的经济史论文占比已从峰值锐减至低谷，20世纪80年代成为经济史研究的“至暗时刻”。^①

直至21世纪历史才出现转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对“历史重要”的重申，以及计量经济学中因果识别革命的爆发，经济学开始发生一场历史转向。经济学各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涌现出了一大批历史类成果，而且其中大部分研究都依赖历史自然实验，涵盖经济增长与发展、环境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宏观经济学等。2004—2014年期间，美国三大顶级经济学期刊的经济史论文占比已经回升至1920—1930年代的鼎盛水平。不过，驱动这次转向的不再是历史学家向经济学靠拢，而是经济学家主动转向历史，寻找能够解释当代经济问题的历史证据。从时间尺度上看，当前经济学“记住历史”的研究，不仅包含计量史学，而且涵盖以短期政策效果评估为核心的实证研究、涉及经济学范畴和理论而跨越更长时段的传统经济史学研究。三者和方法工具、问题导向和数据资料来源上存在显著差异。

短期政策效果评估研究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技术储备最充分、论文产出最密集领域。双重差分、断点回归、工具变量、合成控制等因果推断工具被系统应用于农业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等议题。这类研究在方法上高度依赖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先从既有理论推出可检验的假说，再以中国数据加以实证验证，最后在异质性分析中呈现中国问题的偏差。这种研究尽管常常被诟病为“跑中国数据”，不过从发现偏差的角度而言，也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因为与既有理论、既有假说的不符，往往是产生新范畴的基础，而且此类研究虽然着眼于政策冲击，但本质上也是通过大量累积短期政策效果评估，逐步记住重要的时间和事件节点。对于“挖掘历史”而言，它有聚沙成塔的功能。其缺陷主要是往往止步于政策评估，在追问“为何在中国呈现这种效果，这一效果背后的制度条件从何而来”时表现得过于简略。而这类研究本身就具有热点效应且各分支学科领域选择的切入点本来就分散，如果实证结果无异常的反直觉发现、异质性又呈现为常规化，这类研究对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体系，就往往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

计量史学以长期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是当前数量增长最快、影响最广的历史经济研究类型。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采用历史自然实验的方法进行持久性研究。所谓历史自然实验，是指利用历史上偶发的、非预期的事件作为准实验的分组机制，识别历史事件对经济结果的因果效应。按照研究目标的不同，历史自然实验的应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经济史学家的传统重点问题为导向，用现代计量工具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例如利用地轴振荡分析新石器革命中农业起源的驱动因素。^②二是检验既有经济学理论，例如以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南北差异为实验检验幼稚产业保护假说。^③三是建立历史事件与当代结果的因果链接，即持久性研究，其典型逻辑是以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外生冲击为处理变量，检验其对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后经济结果的持久效应，例如以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识别殖民制度类型对当代人均GDP的因果效应^④。在这三种类型中，持久性

① R. Abramitzky. "Economics and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i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636, 2015.

② A. Matranga. "The Ant and the Gasshopper: Seasonality and the Invention of Agriculture". New Economic School Working Paper, 2017.

③ R. Juhász. "Temporary Protection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Evidence from the Napoleonic Block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 (11): 3339-3376.

④ D. Acemoglu,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Working Paper No 7771, 2000.

研究的数量增长得最快，其影响最广。

然而，历史自然实验方法往往存在如下问题。从方法本身看，历史自然实验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面临三类典型风险。一是外生性虚假：历史上看似外生的事件，往往发生于特定的地理、制度和政治结构，而这些背景条件可能与被解释变量本身相关，从而削弱工具变量的排他性。二是工具变量的公地悲剧：一个历史工具一旦被证明有效，就会被不断地复制使用，长期累积之下这不仅可能耗损其识别稀缺性，也会放大同类研究之间的依赖与偏误^①。三是伪显著：研究者在历史材料中反复搜寻潜在工具变量时，容易从大量尝试中挑出偶然显著但识别力不足的变量，从而产生看似成立、实则不稳健的因果推断。从结果上看，历史自然实验方法也有两个弊端。一是研究问题的结构性偏向。只有那些恰好存在可构造外生变量的历史问题才会被研究，这样会形成所谓的“路灯效应”（streetlight effect），即只看有数据的地方，将历史视为寻找识别变量的采石场^②。二是历史材料的单向度化。因为历史自然实验方法往往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化为可量化的处理变量和结果变量，这就需要将丰富的历史压缩为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③在工具导向下，经济学家在记住历史的同时，也选择性地压制了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冲动。

因此，持久性研究虽然看起来是在探寻历史的长期影响，但在计量方法导向下，面临的困难更多，其信度也更差。因为时间跨度越长，变量在历史中发生性质转变的可能性越大，持久性也就越低，识别偏误也就越大。格雷戈里·凯西（Gregory Casey）与马蒂亚斯·克伦普（Matthias Klemm）指出，持久性研究的回归系数存在系统性上偏，且时间跨度越长，偏误越大。^④例如，萨斯卡·O. 贝克尔（Sacha O. Becker）和卢德格·沃斯曼（Ludger Woessmann）研究的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传播对当代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的持久影响^⑤，但新教化程度在历史中具有较高的持久性，历史与现代测度指向的是同一特征、偏好或态度，凯西和克伦普等人的修正使其系数仅下降了9%。但在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关于殖民者死亡率的研究中^⑥，殖民制度安排与当代制度质量之间跨越了独立运动、制度重建、政治转型等多个历史环节，殖民制度的持久性远低于新教化程度，修正之后的系数就需向下调整约67%，这意味着在原本识别出的殖民制度对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中，有将近大半是由传递损耗造成的统计放大。

经济学记住历史的第三种方式集中于传统经济史学研究。这类研究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跨度上捕捉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并尝试提炼具有理论意涵的分析范畴。与前两者不同的是，这一传统天然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体意识，其代表性学者在长时段、大跨度的历史观照中，尝试提炼了一系列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学术范畴。例如，吴承明在对明清市场网络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演进的考察中，提出本土市场内生性演进等命题，强调中国近代经济并不是单纯由外来冲击

① R. Morck, and B. Yeung, “Economics, History, and Caus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678, 2011.

② D. Cantoni, and N. Yuchtman, “Historical Natural Experiments: Bridging Economics and Economic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754, 2020.

③ G. Austin, “The ‘Reversal of Fortune’ Thesis and the Compression of History: Perspectives from African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8, 20: 996-1027.

④ G. Casey, and M. Klemm, “Historical Instruments and Contemporary Endogenous Regressor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8716, 2021. 阿西莫格鲁等人用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的研究存在时间间隔问题：工具变量（殖民者死亡率）影响的是1800年左右的制度，但回归中使用的内生变量是1990年代的制度质量，中间跨越了近200年。由于制度持久性不完美，传统IV估计存在偏误。凯西和克伦普发现，传统2SLS估计的殖民者死亡率通过制度对当代收入的影响系数约为0.433，修正后的长期效应约为0.144，即修正后的效应约为传统估计的33%，下降了约67%。

⑤ S. O. Becker, and L. Woessmann,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2007, 124 (2): 531-596.

⑥ D. Acemoglu, et al.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5): 1369-1401.

被动塑造的,而是内部要素在超长时段中耦合、流变的结果。^① 赵德馨通过对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的长期系统研究,提出了包括独立与富强双重任务、社会转型期经济二元结构演变等命题。^② 叶坦则立足于经济思想史的宏观视野,通过对富国安民、义利之辨等古典文献的考证,系统分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传统经济理性、官民共济等观念。^③ 这些概念和命题不仅对理解历史,而且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较高的启发价值。但从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要求来看,这一传统在提供概念和思想支持的同时,也面临着历史叙事、文献考据与经济学分析范畴之间的语义障碍,它们虽然在定义上表现出高度的历史特定性,但缺乏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者的必要关注、充实和应用。这就使其学术对话与传播主要局限于历史学家与思想史学者。

这三种研究形态在特定的时间尺度上进行,分别形成了具有鲜明学科标识的阵营。但从“记住历史”的角度看,短期政策效果评估研究在聚焦于政策史的短尺度问题时,会将更长时段形成的结构性条件视为给定背景。计量史学的持久性研究则在技术工具主义导向下,往往将复杂的历史演化裁剪、压缩为单一回归方程中的控制变量与外生冲击,割裂了不同时段之间复杂历史事件的累积因果联系。传统经济史学研究虽然敏锐地触及了历史的深层结构、文明基体与长时段的演化逻辑,但因缺乏与现代经济学对接的接口,其丰富的学术洞见难以成为经济学的分析性范畴,因而止步于史学的叙事框架。

在经济学对历史的考察中,分割式的研究路径会造成不同历史时段、不同层级经验而无法形成有效对话,直接导致研究者难以区分、提炼历史进程里范畴、事实与规律当中的“变”和“不变”。如前所述,经济学需要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科学和进化生物学一样,不能进行可控实验,因此,经济社会的历时进程就成为替代可控实验的开放实验。对这种根本没有设计、没有控制的开放实验而言,只记录实验进程和结果而不提问或者错误地提问,都不能形成范畴和理论。社会科学需要依托长期历史进程开展比较分析,通过回溯与对照提炼因果机制假说,在长期历史进程中进行比较分析,不仅需要就当下进行“功能发问”,还需要“向前发问”追问起源,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范畴和理论假说。批判实在论所倡导的“历史发问—比较观察—回溯假说”的方法,就是比较不同时段的历史现象,识别特征差异与驱动因素,借助回溯法提出因果机制假说,将假说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和开放的未来中进行验证,形成兼顾普遍性与历史特定性的解释。这意味着,历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于,既要为发问提供“如何而来”的历史维度,又要为界定“变”与“不变”提供观察基础。

也正因如此,社会科学一向重视时间尺度。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一般可分为短、中、长三种时段,分别受快、中、慢三类变量的作用,只有将三种时段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显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意义。^④ 经济学要记住历史,就不能固守单一时间尺度,而要让长、中、短尺度的研究结论相互印证,在不同的尺度上形成彼此的“滋养”;充分挖掘不同时间尺度中不同历史材料的理论价值,避免分割式历史研究带来的偏误。

三、时间尺度的层次结构:历史分析的认识论基础

(一) 时间的尺度:从布罗代尔、威廉姆森到霍奇逊

历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者,尽管其问题意识各异,但都意识到了时间尺度选择的

①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8-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② 赵德馨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等著作中指出,近代中国未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与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完整的国家主权,并认为无独立则无富强,富强是独立的保障。

③ 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185-191、24-60、144-191页,北京出版社,1991。

④ 陈争平:《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新世纪经济史学刍议》,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3)。

意义。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区分了以地理生态结构为内容的长时段、以经济周期与社会结构为内容的中时段、以政治事件为内容的短时段，认为在错误的时间尺度上提问必然会产生解释偏差。^① 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也认为，在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对短期可观察变化的偏向会遮蔽真正决定结果的深层慢速机制。^② 在道格拉斯·C. 诺斯（Douglass C. North）那里，制度变迁的速度也因制度形态不同而不同，非正式制度的变化以世纪计，而正式制度的变化则要快得多。制度是经济行为的基础框架，决定了交易成本、激励结构与长期经济绩效，因此，制度被诺斯称为“根本性约束”。^③

或许是不满于诺斯这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含糊，同时为廓清“根本性约束”的层级结构，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将时间尺度分为四个分析层次：以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为内容的嵌入性层（L1，变化周期为数百年到千年）、以产权、政体、司法为内容的制度环境层（L2，数十年到百年计）、以契约与治理结构为内容的治理层（L3，数年到十年计）、以价格与数量为内容的资源配置层（L4，连续的时间调整）。按照威廉姆森的框架，不同的时间尺度适用于不同的理论分析。交易成本经济学仅在数年到十年计的治理结构这一层级上。既然诺斯称制度是根本性约束的，那么威廉姆森就干脆将其命名为一阶约束（1st order economizing），并将这一形成与变迁需时“数十年到百年计”的领域交给了产权经济学。而最短的、连续调整的时间尺度，则是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委托代理理论的适用尺度。

在威廉姆森的时间层次中，在用某一适用理论分析某一针对性层级时，高层对低层的关系是单向给定（见表1）。例如，将L1（嵌入性层）定性为非计算性的、自发的，就是将这一时间段的制度产物处理为外生的文化背景，因此分析产权时就要把L1（嵌入性层）视为给定不变，分析治理结构时必须将制度环境视为给定，以此可以类推。层次之间的动态互动并不在威廉姆森考虑的范围内。

表1 制度的经济学^④

制度的经济学层次	分析内容	时间变化频率（年）	分析目的
L1	嵌入性层 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规范、宗教	数百年到千年	往往是非计算性的、自发的
L2	制度环境层 博弈的正式规则——尤指产权（政体、司法、官僚体系）	数十年到百年计	使制度环境趋于合理，一阶约束
L3	治理层 博弈的运行——尤指合约（使治理结构与交易相匹配）	数年到十年计	使治理结构趋于合理，二阶约束
L4	资源配置层 资源配置与就业（价格与数量；激励对齐）	连续调整	使边际条件趋于合理，三阶约束
对应学科：L1：社会理论 L2：产权经济学/政治理论 L3：交易成本经济学 L4：新古典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			

与威廉姆森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内核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同，杰弗里·M. 霍奇逊（Geoffrey M. Hodgson）提出的凡勃仑制度主义则秉承了凡勃仑的本能传统，将制度演化纳入本能—习惯—习俗—制度四个层次的分析框架。^⑤ 四个层次对应的分析范围和行为主体不一样：本能和习惯是个体层面的，但本能是在群选择中跨代传承的，习惯则贯穿单个主体的生命周期。习俗是局部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② 保罗·皮尔逊：《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③ 道格拉斯·C.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07页，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④ 资料来源：O. E. Williams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0, 38 (3): 597.

⑤ 杰弗里·M. 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1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的、小共同体的共有知识。制度则涵盖第三方强制实施、可处理匿名交往的规则体系。在问题指向上,对本能的发问指向行为倾向的演化起源,对习惯的发问指向个体行为模式的形成机制,对习俗的发问指向非正式规范在小共同体内如何形成并跨代传递;对制度的发问则指向涵盖第三方强制执行的正式规则体系如何在历史上出现并演化。

与威廉姆森将不同层级交给不同理论不同,霍奇逊认为制度分析既要承认重构性向下因果(reconstitutive downward causation),因为慢速层次会长期约束快速层次,同时又要体现累积因果(cumulative causation)原则,刻画快速层次的持续叠加以极缓慢的速度塑造慢速层次。^①这与约翰·R.霍尔(John R. Hall)的观点有类似之处。在霍尔看来,不同尺度有各自相对自主的时间节奏,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决定论,而是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中的相互关联。^②

本能—习惯—习俗—制度四个层次对应不同的时间尺度。对本能的追问,需要把时间尺度推至史前史,分析对象是人类经济行为倾向的生物演化起源。对习惯的追问,时间尺度就收缩至个体的生命周期,分析对象是特定环境如何塑造稳定的行为模式。对习俗的追问,时间尺度就扩展至小共同体的跨代积累,对象是非正式的规范如何在社会互动中沉淀为集体共识,并在没有第三方强制实施的条件下维持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秩序。对制度的追问,时间尺度就需要在习俗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取代之后。相较于以小共同体为单位的习俗经济,这一阶段的市场经济存在国家、军队、法庭这类第三方强制实施的力量。匿名交往的规则体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在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中演化就是这一尺度中不可回避的主题。

(二) 历史经济分析的时间尺度框架

如果将威廉姆森和霍奇逊的两套框架进行对照,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对应关系。霍奇逊的本能层次即人类行为倾向演化形成的阶段,是威廉姆森框架中嵌入性层(L1)的向上扩展,属于史前史(prehistory)尺度^③。霍奇逊的习惯—习俗层次对应的,则是威廉姆森的L1,也即嵌入性这一层。霍奇逊的制度层次与威廉姆森的制度环境(L2)基本对应。如果借助波兰尼的“嵌入”和“脱嵌”概念^④,霍奇逊的习惯—习俗层次和威廉姆森框架的(L1)层次,就是在市场经济未形成之前的习俗经济,也即“嵌入”的阶段。鉴于这一阶段的漫长,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明史尺度。在“脱嵌”之后,无论是霍奇逊的制度,还是威廉姆森的制度环境(L2),则集中于正式制度的形成时期,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制度史尺度。而威廉姆森的L3与L4则可以被视作政策史尺度,因为治理结构与价格机制都属于既定制度框架下的运行层面,会受政策的影响而调整。

史前史、文明史、制度史和政策史的时间尺度,是问题导向下的参照体系,而不是对历史的静态分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演化史对应史前、文明史对应古代、制度史对应中世纪至近代、政策史对应当代。传统历史学的分期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强调连续性,但往往容易产生研究的割裂和视野的遮蔽。而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提出的“宏观史”(macrohistory/big history)的要旨,就是主张研究者不要被惯常的时间框架束缚,要进行“尺度的游戏”(the play of scales),即

① 向下因果(downward causation)本是进化论术语,霍奇逊将其延伸来分析制度等高层结构约束个体行为、规定个体能做什么,而重构性向下因果则是指制度通过塑造习惯,实质性地改变个体的偏好与倾向,使个体向成为什么发生转变。参见G. M. Hodgson, "The Hidden Persuaders: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27 (2): 159-175.

② J. R. Hall, "The Time of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imes", *History and Theory*, 1980, 19 (2): 113-131.

③ 史前史在霍奇逊的语境中,等同于演化史,下文同。

④ 在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中,嵌入(embeddedness)指在前工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中,经济不是独立领域,而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宗教习俗和文化规范之中。而脱嵌(disembeddedness)则指进入自由市场经济时代之后,经济成为独立的、支配性的力量。在波兰尼看来,彻底的脱嵌是不可能的。

将在不同尺度间的移动作为一种认知策略。^① 也就是说，同一历史时期内的经济现象，可以在多个尺度上同时被分析；同一类型的研究问题，无论发生在哪个历史时期，也可能属于同一分析尺度。尺度的归属由问题的性质决定，而不是由事件发生的年代决定。例如，文明史尺度和制度史尺度的区分，不是按照古代、近代这种标准划分的，而是按照分析对象的性质来界定的。制度史尺度分析的是正式规则，或有明文规定、有第三方强制执行、可以通过政治决策改变的制度安排，而不管它发生在什么时期。科举制度何时建立、唐代科举和明代科举有哪些规则变化、科举废除如何影响了地方精英结构，都是制度史尺度的问题，因为它们追问的是正式规则的形成、演化与路径依赖。但文明史尺度分析的是集体认知框架，是内化在共同体成员习惯与预期中的行为倾向和价值判断。科举制度本身是制度史尺度的问题，但科举制度为什么能在中国延续一千三百年，这背后的“士”文化如何内化为集体认知、如何使科举制度正当化不言而喻，就是文明史尺度的问题。简言之，制度史尺度研究规则是什么，文明史尺度研究人们为什么认为这个规则是理所当然的。

按照重构向下因果的原则，制度史尺度的主题分析，正式规则的形成、演化与路径依赖，要以文明史尺度形成的集体认知框架^②和信念为约束因素而不是给定条件。一项制度史尺度的研究的故事背景可以是古代也可以是现代，但其前置的文明史尺度问题不一样。汉代盐铁专卖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提出的是同一性质的问题，都是正式规则如何在政治博弈与经济约束下演化，因此都属于制度史尺度的问题。但前者要求研究者预设一个以农耕文明、中央集权为基础的文明基体；后者则要求预设一个正在经历工业化、市场化转型和全球化融入的现代文明基体。认为古代的问题天然属于文明史或制度史尺度、当代的问题天然属于政策史尺度，就是把经济分析的时间尺度理解成了历史分期。

据此，我们可以把历史经济分析区分为四个时间尺度^③（见表2）：

一是演化史（也称史前史）尺度。分析对象是人类经济行为倾向的生物演化起源，包括时间偏好的形成、损失厌恶的适应性根源、合作与互惠的进化逻辑等。在这个尺度上，理论工具主要来自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考古材料提供间接证据，基因数据和跨文化心理学实验提供直接证据。持久性研究在这一领域有所涉及，例如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数据解释新石器革命^④；内森·农（Nathan Nunn）甚至认为，应当结合生物和文化进化理论来解读人类历史^⑤，两者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历史持久性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演化史尺度的分析揭示的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共同底层逻辑，但在解释不同文明在政治、经济上的多样性方面的贡献有限。

二是文明史尺度。分析对象是在超长时段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互动中逐渐形成的集体认知框架与经济伦理，给定条件是演化史尺度形成的行为倾向。它对应霍奇逊框架中的习俗层次，也对应威廉姆森 L1 层的实质性内容。这个尺度上形成的结构，包括对产权边界的理解、对陌生人交易的信任预期、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认知、对商业活动的道德评价等，是无数代人在特定生态条件、地理环境、族群互动中通过累积因果反复强化后沉淀下来的集体认知框架。根据霍奇逊的重构向下因果，这

① D. Christian. "Macrohistory: The Play of Scales".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2005, 4 (1): 22-59.

② 认知框架（cognitive framework）和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来自诺斯与邓扎乌的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s）概念，指人们用来理解和诠释世界的共享概念结构，包含对因果关系的基本判断和对制度正当性的认知等。

③ 第二节的分类中，我们并未将这一类别单独列出，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没有涉及演化史尺度的分析。对于合作倾向、公平倾向这类主题的研究，以叶航等人代表的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也积累了相关成果，但这种研究主要是通过仿真模拟实现，在方法和结论上与桑塔费学派接近。因此，我们未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型列出。

④ A. Matranga, and L. Pascali. "The Use of Archaeological Data in Economics". In A. Bisin, and G. Federico (eds.). *Handbook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Elsevier, 2021, pp. 125-147.

⑤ N. Nunn. "Historical Legacies: A Model Linking Africa's Past to Its Current Under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3: 157-175.

一框架一旦形成,就会通过影响个体习惯的形成环境,对制度选择和政策效果产生持续的约束。它约束的不只是行为者能做什么,而且会约束行为者在认知上认为什么是正当的、可行的。

三是制度史尺度。分析对象是正式规则的形成、演化与路径依赖,给定条件是文明史尺度的集体认知框架。它对应霍奇逊框架中从习俗向制度的转化,也对应威廉姆森 L2 层的制度环境。商帮制度从商业习惯向行业规范的演化、土地制度从习惯性占有向法律确认的转变、货币制度从民间信用网络向国家背书体系的变化,都是这一尺度的典型分析对象。这些制度的型构过程既受到文明史尺度集体认知框架的约束,又受到具体历史条件下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的塑造。不同文明基体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演化路径,这是制度多样性形成的根本原因。

四是政策史尺度。分析对象是既定制度框架内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效果评估,给定条件是制度史尺度形成的制度环境。它合并了威廉姆森 L3 与 L4 的内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政策的设计、货币政策的传导、贸易战的冲击等,都是这一尺度的分析对象。双重差分、断点回归、合成控制、平行趋势检验等现代计量方法在这里被大量使用,回答政策产生的效果及其传导机制。

表 2 历史经济分析的时间尺度框架

层次	分析内容	时间量级	任务
演化史尺度 (史前史)	本能层, 威廉姆森框架的向上延伸 分析对象: 人类经济行为倾向的生物演化起源	万年以上	揭示人类经济行为倾向的起源
文明史尺度	习俗层, 威廉姆森的 L1 分析对象: 集体认知框架	数百年至千年	提炼文明基体特征
制度史尺度	制度层, 威廉姆森的 L2 分析对象: 正式规则的演化	十年至百年	识别制度变迁的因果效应
政策史尺度	治理层, 威廉姆森的 L3+L4 分析对象: 既定制度框架内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效果评估	数年至十年	评估政策净效应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四个时间尺度同时构成一套层级嵌套、动态传导的分析结构: 演化史尺度形成的行为倾向, 是文明史尺度集体认知框架和信念形成的生物前提; 文明史尺度沉淀的集体认知, 又是制度史尺度正式规则演化的无形基础; 制度史尺度形成的路径, 又决定了政策史尺度的政策工具效率。在累积因果与重构性向下因果的视角下, 慢速层次形成的结果会持续约束快速层次, 快速层次的长期叠加又极缓慢地重塑慢速层次。

不同时间尺度共同构成一个层级体系的分析框架, 集体认知约束制度选择, 但文明史的集体认知形成的机制不适用于政策史的政策效率研究。即便在宏观经济学内部, 经济学家也早已认识到时间尺度的异质性决定了机制的异质性。短周期的机制解释不能直接用于长周期, 长周期理论也不能用短周期工具来检验。短周期在每个商业循环中存在, 长周期在多个短周期的积累中运行; 两者同时发生但机制性质不同, 同样也是层级嵌套、动态传导的。^①

从时间尺度的角度看, 当前经济学中的历史持久性研究面临的真正困难, 是建立跨时间尺度传导机制的解释。在大量的持久性研究中, 即使统计上的持久效应存在, 也没有说明效应通过哪个层次、经由何种机制、在哪个时间窗口完成传导, 难以区分“冲击改写了深层结构”与“冲击激活了既有深层结构”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因果路径, 其结论的理论含义也因此是模糊的。这就会导致大量持久性研究会“仪式化地诉诸文化机制”(ritualistic invocation of cultural mechanisms)^②: 研

① L. Bernard, et al. "Time Scales and Mechanisms of Economic Cycles: A Review of Theories of Long Waves".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2014, 2 (1): 87-107.

② H. J. Voth. "Persistence: Myth and Mystery". In A. Bisin, and G. Federico (eds.), *Handbook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Elsevier, 2021, pp. 243-267.

究者在发现某个历史冲击产生了持久效应，但在无法说清楚传导机制时，就笼统援引“文化”作为黑箱解释，声称文化在代际传递中维系了这一效应，而不去真正论证文化通过何种具体路径、以何种速度、在何种条件下完成了这一传递。而且缺乏时间尺度的解释，也需要对历史事件进行大量的剔除、压缩甚至忽视。例如，Ashraf 和 Galor 认为，人类走出非洲时形成的基因多样性是当代财富的核心决定因素，与人均 GDP 呈倒 U 型关系：中等多样性最有利于发展，多样性过高破坏社会凝聚力，多样性过低阻碍创新。^① 从实证检验看，该论文的机制清晰且可被检验，无论是 1500 年前工业化时代的人均 GDP 估算值，还是 2000 年的现代人均 GDP 数据，两个时点的回归结果都支持基因多样性与人均 GDP 呈倒 U 型关系的结论。但这显然忽视了大量历史事件尤其是移民、殖民、气候冲击等方面的影响。而在补充了 Putterman 和 Weil 等人的国家历史解释之后，它才具有更强的说服力。Putterman 和 Weil 等人指出，某地的国家历史长短未必重要，研究重要的是当代人口祖先所经历的国家历史。新大陆有 97% 的人口的祖先来自其他地区，欧洲则有 97.5% 的人口祖先在 1500 年前就生活在当地。经移民调整后，国家历史与农业起源时间对当代收入的预测力大幅提升。^② 而这种解释其实指向的机制是，不是基因本身决定财富，而是长期国家权力的历史积累使社会规范内生，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集体行为预期。Ashraf 和 Galor 用演化史尺度的变量基因多样性解释当代经济绩效，就跳过了文明史尺度的社会规范的形成和制度史尺度的国家权力的积累这些中间传导环节。

四、时间的尺度体系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一）挖掘历史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

经济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特定性。不同社会的不同经济系统、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理空间的经济活动无法用一个“通用理论”解释表现为从马歇尔对“经济理论不是一整套具体真理，而是发现具体真理的发动机”^③ 的判断，到罗德里克强调经济学的进步不是在纵向上逼近唯一理论而是在横向上扩充情境化的模型库^④，以及亚科·库里科斯基（Jaakko Kuorikoski）与卡泰里纳·马尔基奥尼（Caterina Marchionni）等人倡导的巴比伦式的科学观。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只有在方法论意义上保持特定性和一般性的折中，才能使经济学具有可扩展性。

特定性和一般性的折中调和并不是没有原则。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之一，就体现在理论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程度上。自然科学的排他性较强，表现为一种理论一旦得到证实，与之竞争的假说通常会被排除。相比之下，经济学的理论排他性较弱，表现为多种解释框架往往可以同时成立、并存，难以通过单一标准彻底排除其他假说。而经济理论的排他性程度与理论抽象性和现实的复杂性相关：哪些问题可以容许更高的抽象性而不需要太多的复杂性，经济理论就具有更高的排他性；反之，哪些问题需要包容更高的复杂性，而不能容许过高的抽象性，经济理论就具有更低的排他性，可以允许多种范畴、多种命题和解释框架的竞争性解释。简言之，经济理论的排他性与复杂性成反比。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就在于历史可以在理论的抽象性过高时，呈现现

① Q. Ashraf, and O. Galor. “The ‘Out of Africa’ Hypothesis,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1): 1-46.

② L. Putterman, and D. N. Weil. “Post-1500 Population Flows and the Long Run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125 (4): 1627-1682.

③ A. Marshall.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 In A. C. Pigou (ed.).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Macmillan, 1925, pp. 152-174, p. 159.

④ D. Rodrik. *Economics Rule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Dismal Science*.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pp. 45-82.

实的复杂性,从而倒逼经济理论进行调整。正如蒙代尔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时空条件的变迁,曾经有效的模型也可能失效,模型的取舍最终要依据经验相关性与公理自洽性来判断。^①从分析层次和时间尺度的关系来考察,经济学的微观分析中的排他性程度最高,竞争性假说大多能够被有效排除,尤其是在短期问题研究中。与之相反,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往往难以实现假说的排他性。因此,简单的应用微观经济学问题从历史研究中的获益有限,而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问题则更需要历史视角的支撑。举例来说,财政部长在测算葡萄酒税的预期收益时,可获得接近自然科学精度的结论。但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福利效应,因其涉及多重维度与相互竞争的假说,便无法在单一理论框架内作出判定。^②而在复杂问题上,历史知识就能够提供额外的经验信息,这样可以提升理论的解释力。总体来看,时间尺度越长,复杂度就越高;复杂度越高,理论的排他性就越低,可行的模型与解释路径就越多,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就越必要、可行。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抛弃既有经济学知识的概念、问题和理论范式。自主知识的目标在于确立对话双方的对等地位。引入本土经验和本土视角,一是要确立本土知识生产的独立主体性,二是要获得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平等话语权,而不是将本土经验视为主流网络的补充材料,或者建构一个对立的封闭体系。从自主、平等出发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最易于生长新范畴、新命题和新理论的,就应该是那些复杂度高从而排他性程度低的,可以、也必须容纳竞争性假说的领域。这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要“挖掘历史”的根本原因。

(二) 文明史的提炼为何重要

如前所述,尽管政策评估、计量史学和传统经济史学三种类型的研究都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成果,但对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目前这三种类型的研究还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生产体系,而是分属不同群体的三个部分。这固然有知识专业化细分的必然,但对于一个知识体系而言,“分”的目的是为了“合”。将系统简单化地分离,并以还原论的方式进行研究,其目的只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单个系统的性质和构成。它只能成为一个探索复杂现象的必要阶段,而不应成为理论的最终目的。正如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指出的那样:“必须完全同意孔德的看法……孔德的一大贡献是坚持认为社会现象的统一性必然使社会科学家们单一的研究工作甚至比自然科学家们的单一的研究工作更加徒劳无益。”^③

文明史尺度的系统提炼,是促进三种类型研究有机融合的关键环节,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最需要突破的地方。这是由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排他性程度低、必须容纳竞争性假说的复杂问题,才是新范畴与新命题生长的空间,而文明史尺度恰恰在这一维度上具有其他尺度无法替代的优势。从文明史尺度系统处理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并将这种独特性转化为对制度分析和政策分析的前置影响因素,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突破口。因为只有与既有范畴、命题和理论框架对比中发现“不符”时,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可对话的范畴、命题和分析框架。而文明史的跨度,恰好在高复杂性、低排他性上为可对话的范畴、命题和分析框架的形成提供了生长空间。

文明史提炼基础命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关于马格里布商人的研究为例进行说明。^④格雷夫关于马格里布商人研究的核心结论是,经济主体在历史互动中形成

① R. A. Mundell. *Monetary Theory: Inflation, Interest,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 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 78.

② F. Cesarano.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06, 13 (4): 447-467.

③ 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591页,华夏出版社,2004。

④ A. Greif.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2 (5): 912-950.

的共享信念系统，决定了经济组织的形态与边界。集体主义信念产生多边惩罚机制，使得群体内部合作得以在没有正式法律的条件维持；个人主义信念产生双边合约机制，使得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他进而论证，欧洲个人主义信念体系在经济组织上的优越性，是西方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根源。

格雷夫的分析有三个前提假设：第一，信念系统在族群边界内是同质的。格雷夫把马格里布商人作为一个内部信念高度一致的分析群体，多边惩罚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群体内所有成员共享同一套关于违约惩罚的预期。这一前提隐含的假设是：信念系统是在相对封闭的族群边界内形成和传递的。第二，集体主义信念导致经济组织边界封闭或收缩。格雷夫的比较制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集体主义信念产生的组织形式在扩展能力上不如个人主义信念产生的双边合约机制，因为前者依赖群体内部的多边惩罚，而后者能够通过正式合约扩展到任意规模的陌生人交易。这一结论的隐含指向是，所有集体主义信念系统在组织扩展能力上都有局限性。第三，制度演化路径是单向趋同的。格雷夫的历史分析隐含着一个进化论式的叙事：从集体主义的非正式约束走向个人主义的正式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路径。

如果自主知识体系是一种对话而不是一种对抗，那么怎样的中国研究才能形成与格雷夫研究的对话呢？显然，我们不能照搬格雷夫的二分法比较。因为中国文明基体是在超大规模地理空间内，在高原、雪原、中原和山地之间，在农耕、游牧、渔猎民族的反复融合中形成的。这种跨越地理与族群边界的长期互动，发展出了能够持续的包容性信念结构。格雷夫的三个前提假设，对于在相对封闭族群边界内的马格里布商人群体是成立的，但对于在超大规模多元族群融合中形成的中华文明基体则难以成立。因为对中华文明基体而言，信念系统不是在封闭族群边界内同质传递的，而是在多元融合中形成的开放性结构；集体主义信念的组织扩展能力不是由集体主义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信念系统的包容性程度决定的。包容性高的集体主义信念也可能在不依赖正式法律的条件维持和扩展大规模跨族群商业网络。

如果基于中华文明基体的文明尺度提炼相应的分析范畴，那么和格雷夫的对话就可以围绕两个命题展开：其一，信念系统的分析需要引入包容性程度，而不能只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展开；其二，信念系统的形成机制需要被追溯至文明史时间尺度的累积因果过程，而不能只在制度史时间尺度上进行比较。因为同一时刻观察到的信念差异，是由不同文明基体在长时间内通过不同累积路径形成的。这不是对格雷夫框架的全盘否定，而是从中国历史经验出发的一种可对话、可扩展的理论创新，这正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该追求的。因为在文明史的时间尺度上，更有可能被视为普遍的前提其实是特定文明积累的产物，以便提炼出具有竞争性的替代范畴。在文明史尺度上系统提炼文明基体的核心特征，有助于为制度史和政策史尺度的研究提供解释框架的基础，使中国经验中的很多“不符”逐步转化为具有理论含义的可对话命题。

（三）从历史深度到理论高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短期政策影响上，即第一种形态的研究。从时间尺度的层级关联性看，这类研究要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来源，可以经由向上追问，完成更具有历史纵深和中国特色的范畴、命题和分析框架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若干独特现象，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扩散、乡镇企业的兴起与转型、特区模式的点一面推进、地方政府竞争的动力和效果等，都需要超越短尺度视角，在制度史尺度的路径依赖中找到解释，在文明史尺度的认知框架中获得理解从“为什么某个政策在某个地区、某个时段、某类主体有效”向前发问到“为什么这个政策在中国有效而在其他国家无效”，进而追溯“这种有效性的制度条件从哪里来”，最终考察“这种制度条件与中国文明基体的哪些特质相关联”。通过这种在不同尺度上对不同问题形成的不同解释，把政策史尺度的实证研究结论和中华文明基体的关键特

征、制度长期演变过程中的路径创造和路径依赖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在不断累积因果的过程中提出新范畴、新命题,这样逐步地累积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在政策史尺度上对1978年小岗村包干到户的试点与此后历年中央农村政策文件进行研究,其中,微观底层是基层农户的生产决策,可观察的结果是粮食产出、农户经营行为的短期变化,时间窗口在十多年以内。政策效果之所以能够迅速显现并持续扩大,如果单纯从政策的激励结构去诠释,就仅仅是一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激励叙事。分析视野触及制度史尺度时,就能为承包制确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制度设计找到来源,即明清以来田底权与田面权二分这一长期存在的土地权利结构。但故事至此,仍然是一个充满疑虑的路径依赖叙事。我们如果再向上追溯到文明史尺度,就会发现家户本位的经营方式、土地作为生存保障的伦理预期、基于熟人关系的契约履行机制构成了一种底层的集体认知框架。它使恢复家庭经营在认知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这正是承包制能够在短时间内于全国范围迅速推广的认知前提。相较于仅从产权效率角度解释承包制成效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或仅停留在田底、田面权历史考据的传统史学研究,三个尺度的衔接分析就形成了更为体系化的叙事。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尺度的研究也能在问题层面实现交融。

在历史分析尤其是文明史尺度的历史分析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其他理论传统难以替代的方法论优势。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科学方法。他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力,把制度史的分析嵌入文明史演化的长时段过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些范畴,本身就是为理解历史进程的长时段逻辑而发展出来的。当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制度变迁的解释机制时,我们就可以追问为什么特定的制度形式在特定文明条件下具有稳定性、又在什么条件下会走向变革。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诸如货币、价值这些基本范畴,都带有明显的历史科学分析的特征。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就是一个对从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出现的历史进程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变的是等价物的形态,不变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和交换关系。在变的过程中寻求不变,就是从历史材料中提炼范畴;用不变的本质解释其历史形态的差异,就是以范畴为工具的历史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方法,天然地带有一种起源发问,从而能够在长时段的开放实验中提炼“不变”。

提炼“不变”,需要足够的历史长度和历史资料。因为起源发问本身要求一个足够长、足够复杂的历史过程作为质料,否则“不变”无从辨识,“变”也无从对应考察。要在文明史尺度上产生新的范畴、寻求文明史尺度上的“不变”“渐变”和“稳定”及其对当代经济组织和制度特征的长期影响,就需要找到能够承载这种长时段开放实验的历史资料。中国历史经验中呈现的特定形态,诸如小农经济与国家财政汲取、社会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以礼制秩序为基础的商业信任网络,盐铁专卖这类国家深度嵌入经济过程的制度形式,可以和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框架中形成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某些预设,构成实质性对话。这并非没有先例,例如王亚南的研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现实进行对照,先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的货币形态、中国社会的资本形态、中国社会的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中国社会的地租形态、中国社会的经济恐慌形态等。在使用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时,王亚南也是从长期历史分析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中的主要剥削形式不是资本剥削而是土地剥削。中国的农民“不是因为缺少资本而被雇,宁是因为缺少土地而被雇”^①。王亚南之所以得出“中国资本的全运动过程,不论是积累、是集中、抑是分散,都捺上了商业或商业性的印记,而不是产业的”^②这样的结论,也是因为他在长期历史的印证中校准了范畴的特定性。

①②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261、144页,商务印书馆,2014。

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方法去审视文明史尺度上丰富的“变”与“不变”，是“第二个结合”在知识生产上体现出来的最深刻的意义。中华文明是极少数在超大规模地理空间内、历经数千年连续演化并形成完整制度积累的文明之一，它在政治组织、经济协调、社会信任、法律制度等领域积累的历史解决方案，对回答人类社会基本经济问题，如信任的生产与维系、公共品的供给等，提供了另一种历史性回答。在这个意义上，以历史科学方法从中国文明史中提炼范畴，为制度史和政策史的研究提供“不变”的特定性，并不只是要建立一套只能解释中国的本土理论，而是要为现有经济学提供多样性的理论入口，是对人类经济秩序和社会制度复杂性的丰富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历史特质，对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知识体系建构的层面，这要求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时段分析中运用历史科学方法，提炼既根植于中国历史经验又具有普遍理论解释力的经济学命题。这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去套中国历史，也不是用中国历史材料去印证既有教条，而是以历史科学方法为方法论基础，在中华文明的长时段演化中追问诸如制度特征的来源、生产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这些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方法所擅长的分析对象，又是在文明史尺度上建立中国经济学自主基础理论命题所必须回答的关键。

五、结语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从最初的经济理论源泉到被过滤掉的背景噪声，再到如今成为因果识别的资料，每次转变都体现了经济学记住历史方式的变化，也体现了经济学能从历史中提取的知识类型。当代历史经济学以历史自然实验为主要工具，在制度史尺度取得了因果识别的成就，但这一方法的有效运作依赖可辨识的事件起点、可比较的处理组与对照组、有限时间窗口内未被打断的因果链条等一系列条件。这种“有因果才有历史”的选择性记忆方式，固然可以提升历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有助于历史资料的数据化整理，却容易将历史演化裁剪成孤立的数据片段。历史不应只是经济学家进行实证挖掘的矿场，而应是提炼经济范畴的基础，在复杂性维度上提供多样的、包容性理论命题的生长空间。

一种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其生长土壤当然是独有的本土经验和独有的视角。然而，从自主不是封闭而是平等对话这一点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平等对话中丰富和发展既有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更适宜的命题和范畴成长空间，不是在“财政部长在测算葡萄酒税的预期收益”这类排他性程度较高的问题上，而是在涉及多重维度、必须存在相互竞争的解释假说这类排他性程度较低的复杂问题上，而在复杂问题上提炼相关范畴、形成命题和理论，必然需要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这是“挖掘历史”对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所以重要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从遵从既有框架、套用中国数据的“跟随式验证”这种高排他性领域，向低排他性的复杂问题领域迈进，从而进入“自主化提炼”阶段。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既不是不加分别地套用既有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所有范畴和理论，又不是一定要从中国经验中推导出普适的经济学“大通用模型”，而是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提炼具有真正可竞争性的、有学理性和解释力的范畴与命题，从而丰富经济学对制度多样性、治理模式、国家—市场关系、技术和组织变迁等一系列本就必须存在竞争性解释的问题的理解。历史的价值不在于确证某种单一理论，而在于呈现人类经济秩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处理“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在有结构的时间尺度上识别出那些具有真正“约束”意义和“硬核”性质

的中国范畴和命题，才能激活历史资源，把历史深度转化为理论高度，使中国经济学真正具备解释自身、与世界对话的能力。

How Economics Remembers History: On the Temporal Sca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YANG Hutao^{1,2}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must “excavate history” because new categories, propositions, and theories tend to emerge in those fields characterized by high complexity, low theoretical exclusiv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accommodating competing hypotheses, the fields that are historically deep and broad by their nature.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current Chinese economics research is fragmented across three mutually isolated domains: evaluation of short-term policy, studies on persistence within cliometrics, and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none of which has formed an effective synergy. Studies on persistence themselves are also limited by their methodology, includ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the streetlight effect. To independently distill distinctively Chinese categories and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from China’s rich historical experience ranging from the collective cognitive frameworks of the civilizational matrix to the developmental practic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coordinated research efforts across different temporal scales. The temporal scale is not merely a question of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but is also an epistemological prerequisite for balancing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against real-world complexity, since different temporal scales entail different research orientations, different causal mechanisms, and different applicable analytical tools. Distil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al matrix at the scale of civilizational history, and promoting coordinated knowledge production across the three scales of civilizational history, i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olicy, will contribute to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that is grounded in its own subjectivity, open to dialogue, and capable of expansion.

Key words: Temporal scal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Historical natural experiments; Civilizational matrix; The Two Integrations

(责任编辑 吴 俊 责任校对 吴 俊 杜心蕾)